



《世界史》以“儒学思想史”的  
“经验”的秩序。这种直接指  
《两难思想史丛书》必然

# 中国近世儒学 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他的另一种形态，  
理念与形式，  
《两难思想史丛书》  
朱鸿林 著 《经典论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前的另一章。清代礼学复兴，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  
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形态，经验世界的秩序。  
在展开开明时代，与理学产

礼制与理对话，  
为关键的。礼教，  
各地风俗）三度空  
并人伦日用经验里

更是礼学转型。  
由思想的互动，  
这种直接经验世界之  
不仅能解公学世界成为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前的另一章。清代礼学复兴，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  
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形态，经验世界的秩序。  
在展开开明时代，与理学产

礼制与理对话，  
为关键的。礼教，  
各地风俗）三度空  
并人伦日用经验里

更是礼学转型。  
由思想的互动，  
这种直接经验世界之  
不仅能解公学世界成为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前的另一章。清代礼学复兴，  
《礼制》（历代律令）和《礼俗》（各地风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中经验里交互影响的

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  
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形态，经验世界的秩序。  
在展开开明时代，与理学产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朱鸿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

(思想史丛书)

ISBN 7-301-09618-6

I. 中… II. 朱… III. 儒家—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190 号

书 名: 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著作责任者: 朱鸿林 著

责任编辑: 谢茂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618-6/K·04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4.25 印张 36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自序

本书所载的十三篇论文,从不同人物的传记、著作和历史评价的述析中,显示出宋末至清初儒者或受儒学影响者的一些学术、文化理念和理想,他们应对所遇到的身心家国和道德文化问题时的思想和作为,以及他们的构思和体现所受到的历史认受。这些人物的个人表现及其获得的当时及后代反应,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世读书人和士大夫对于儒学的实质的思辨、习行和问学情形。各篇论文曾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汇刊,除了改正错误字句、整齐格式之外,遇有修订之处,各于篇末注明。

宋明儒者概括他们的学术时,喜欢说做的是“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工夫;易以现代语言,可以说是先做凡进的基础研究,然后再提升到高深哲理的探讨。本集各文,都是下学的表现,但愿它们对于从事上达的学者,也有一些参考价值。现代出版图书,不会灾及枣梨,却还有祸及纸张之虑,我希望向我征稿并负责编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谢茂松先生,不会因此遭受助长破坏自然生态的指摘。

朱鸿林

2005年4月18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 目 录

## 自 序 /1

### 理论型的经世之学

- 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 /1
- 一 引 言 /1
- 二 《大学衍义》的特别强调——“诚心”理念 /3
- 三 真德秀的政治遭遇与著作《大学衍义》的关系 /6
- 四 真德秀对宋理宗的观感与《大学衍义》的用意的关系 /9
- 五 《大学衍义》的评价与经世之学内容的争论 /13

### 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 /20

- 一 前 言 /20
- 二 熊禾的传记资料检讨 /21
- 三 熊禾的生平和历史待遇 /24
- 四 结 语 /30

### 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 /37

- 一 前 言 /37
- 二 熊禾的师承问题 /38
- 三 熊禾的学术思想和主张 /42
- 四 熊禾的学校祀典议论 /46
- 五 熊禾的著述 /50
- 六 熊禾的文集 /53
- 七 熊禾从祀孔庙的议案及其意义 /58
- 八 结 语 /64

**明太祖的孔子崇拜/70**

- 一 引言/70
- 二 野史对明太祖的误会事例/71
- 三 元朝的孔子崇拜情况/74
- 四 明初的兴学与祭祀先师礼仪/79
- 五 明太祖对衍圣公和孔裔的礼遇/87
- 六 明太祖朝孔庙祀事的议论/96
- 七 结论/106

**丘濬《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120**

- 一 引言/120
- 二 《朱子学的》的内容/122
- 三 《朱子学的》的宗旨和编纂理据/127
- 四 宋元朱子学读本的编辑和流传/131
- 五 结语/137

**《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143**

- 一 引言/143
- 二 《朱子学的》的版本与流传情况/145
- 三 《朱子学的》的评价/153
- 四 结语/156

**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162**

- 一 引言/162
- 二 《大学衍义补》的著作意旨与背景/163
- 三 《大学衍义补》的内容梗概/165
- 四 《大学衍义补》的影响/167
- 五 结语/177

**陈白沙的出处经验与道德思考/185**

- 一 引言/185
- 二 中年以前的遭遇与言论/187
- 三 应召入京的始末/192
- 四 后期对出处问题的看法/204

- 五 结 语/212
- 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通》的政治背景  
与内容特色/220
  - 一 引 言/220
  - 二 湛若水与《格物通》的问题/221
  - 三 《格物通》的政治背景/228
  - 四 《格物通》的内容特色/241
  - 五 结 语/249
- 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259
  - 一 引 言/259
  - 二 沙堤乡约时代增城县的问题/261
  - 三 沙堤乡约的地点/263
  - 四 组织、成员、经费/265
  - 五 缘起与实现——湛若水家族与个人历史/266
  - 六 活动项目和仪式/272
  - 七 乡约约文和训谕经书讲义/274
  - 八 目的与特色/277
  - 九 成效探讨/281
  - 十 从沙堤乡约看明代乡约的性质与功效等/286
  - 十一 沙堤乡约所见的乡约明代中叶意义/297
  - 十二 结 语/300
- 《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312
  - 一 引 言/312
  - 二 从祀阳明历程的开端/314
  - 三 《王文成公全书》编刊者谢廷杰的事略/315
  - 四 有关杭州本与应天本《王文成公全书》的问题/317
  - 五 阳明从祀的再议/322
  - 六 隆万间人对阳明的认识及其意义/323
  - 七 结 语/328

4 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略论叶春及之功业和经世政论/334**

- 一 引言/334
- 二 叶春及的功业/335
- 三 叶春及的经世政论/341
- 四 余论/347

**为学方案**

- 学案著作的性质与意义/355
- 一 引言/355
- 二 “学案”的定义与体裁/356
- 三 早期学案著作的意旨与性旨/358
- 四 《明儒学案》的“学案”意义/366
- 五 “学案”观念与获学之道/371



# 理论型的经世之学

——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

## 引言

《大学衍义》的特别强调——“诚心”理念

真德秀的政治遭遇与著作《大学衍义》的关系

真德秀对宋理宗的观感与《大学衍义》的用意的关系

《大学衍义》的评价与经世之学内容的争论

## 一 引言

南宋著名儒臣(理学家官僚)真德秀(1178—1235)所著《大学衍义》(以下简称《衍义》)一书,在14世纪后的中国(元代中期后)极负盛名。由于元、明两代朝廷尊崇程、朱学说,作为朱学后劲的真德秀,在理学道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衍义》的地位在朝廷高级文官的心目中也不断高升。在官朝的赞助和程朱理学道统的声势下,它成为经筵必讲之书。不仅这样,由于经筵最终的目的是在于经世,它又变成了谈论经世之学者的必读之书。

## 2 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由于现实与学风的变化,现代学者对《衍义》再也不像帝王时代般的热心。但研究和讨论它的大有其人,日本的间野潜龙和美国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二教授便曾各有文章介绍它。间野概述了它的结构和探讨它在宋、元、明三代所受尊崇的情况。<sup>[1]</sup>狄百瑞在分析真德秀另一著作《心经》所反映的思想时,也附带论及它与帝学及心学的思想关系。<sup>[2]</sup>然而,对于真德秀著《衍义》时所处的环境和书中的主题的相互关系,却还没有充分的研究。本文目的,就在补充此点。

《大学衍义》一书的命名,源自《四书》中的《大学》;所谓“衍义”,是填实和发挥之意。<sup>[3]</sup>顾名思义,真氏书便是要推衍《大学》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条目的命意,并赋予它们一定的实用意义。但在《衍义》里,真氏实际上只阐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目,而不及治国、平天下二目。真氏在此书的序中强调《大学》有能使人君“清出治之源”,使人臣“尽正君之法”的巨大作用。那么,他所推衍的六个条目,无疑便是清明政治本源的大法;只要把这六个条目充分体验,余下的二目,自可迎刃而解。这正是理学家扩而充之的逻辑,一理通百理明的推致之说。真氏的构想,看来和一般唯心理学家并没有不同。理学家喜欢“体用”之说,认为《大学》是“全体大用”之书,又认为用本于体,只要掌握了体,便自然能发挥用。换言之,虽然未推衍《大学》中的治国、平天下二条目,却不等于大学之道不能实现。基于此,真氏对于没有完整地推衍《大学》各条目一点,至少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自圆其说。

但这种认识和推理的体现,实际上却使《衍义》本身存着若干理论上和应用上的缺憾。尽管《衍义》曾为经筵常见之书,它的实用性却有局限。这局限连程朱学派的学者也对之不满。明代成化间的著名儒臣丘濬(1421—1495)便曾对它加以补充,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著成同享盛名、同被视为经世之学不可或缺的《大学衍义补》(以下简称《衍义补》)一书。

和真氏书比较,丘氏书除了在理学家的精神上有可贯通之处及在形式结构上略似外,其内容及其强调所在,是绝对不同的。简单地说,丘濬著《衍义补》的目的,是在使该书成为应用经世学的参考读物,同时又为针对明代中期的政治形势而作的变法蓝图。这个论点在笔者所撰论文中曾有所分析

论证，<sup>[4]</sup>这里不拟多说。所要指出的是：自从《衍义补》出现后，人们大多数认为丘氏补充之举及所补充的内容是合理而适当的。换言之，就经世之学的范畴而论，真氏《衍义》确有不足之处。

《衍义》对发挥《大学》之道有所缺憾是事实，但这缺憾何以会出现，却不是简单的问题，至少不应是仅如上面所提及的推致之说的逻辑问题。朱熹（1130—1200）始终坚信，《大学》此书对于导致治隆俗美的政教而言，“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sup>[5]</sup>真德秀作为朱学的重要后劲，是不可能这样有头没尾地草率推衍而公然进呈御览的。这样看来，《衍义》所反映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不可能单纯是学说理念变改的结果。相反地，它们应是真氏特别用心的结果，而这又应与他著书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掌握这一连串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便是本文的旨趣。

## 二 《大学衍义》的特别强调——“诚心”理念

《大学》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文，但《衍义》一书着力之处，却在其对“诚心”一理念的特别强调。“诚心”理念并非真德秀所创，而实源于北宋周敦颐（1017—1073）所说。《衍义》首章题作“帝王为治之序”，对此理念便有详细导论。此章是全书最重要的理论部分，不但提撮了真德秀所阐论的经世原则，也提示了全书结构的逻辑。由其设论之精心巧思，“诚心”几乎可说是真氏经世之学的第一原则。

真氏这个原则的建立，主要是由对古代儒家经子为主的言论的引用和安排所致。《衍义》首章共有十三条引文，在真氏刻意的安排下，前面层层发展的十二条，无非是在证明最后所引周敦颐所说的一条是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其所引周敦颐说较重要的部分如下：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焉。<sup>[6]</sup>

此文词意明白,真氏所欲借以传达的主意,可以不言而喻。他又接着强调:“敦颐之言,与前圣实相符契。”这样一来,真氏便把“诚心”说成是古今贤圣所共同肯定的原则。

周敦颐“诚心”之说和所谓《大学》八条目之说有关,为了把两者直接连贯起来,真氏对上文又加补充阐释。他说:

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诚。诚者无它,不善之萌动于中,则亟反之而已。诚者,天理之真;妄者,人为之伪。妄去则诚存矣,诚存则身正,身正则家治,推之天下,犹运之掌也。敦颐之言,渊乎旨哉!<sup>[7]</sup>

这样,真氏不独把周氏之说和《大学》之说建立了作用关系,连对正身(如《大学》的“修身”)也赋予了特定的抽象方法。这抽象方法就是不断的内心自我检讨与控制。换言之,在能诚心之前,必须先立志诚心和刻意除妄。由此推衍,经世的头条原则和首要急务,便成了君主自我立下正确决心之事,“诚”只是该项决心的充实光大;没有诚,《大学》中的修身、齐家等要目,大可不必谈了。

“诚心”和“诚意”不必尽同,但“诚”却是《大学》中的重要理念。为了肯定诚的重要性,真氏不得不先肯定《大学》的重要性。在《衍义》首章里,他又把《书经·尧典》予以理论化,尊为“《大学》之宗祖”。<sup>[8]</sup>“宗祖”指的是思想传授上的始祖,而《尧典》又被认为是第一圣王的训诰,这样,《大学》所说的,便变成了是直接继承帝尧所授的。历史和思想的渊源既然俱备,《大学》便不可不信,诚也不能不存。

真氏除了引《书经》、《易经》、《中庸》、《孟子》、《荀子》之说以支持《大学》所载君主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而天下平之说外,更援引了汉儒董仲舒和扬雄之说,以支持他自己所强调的人君治国以心之运用为要的论点。董仲舒说过: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物殖……<sup>[9]</sup>

此说北宋程颢(1032—1085)曾作部分引用，并加发挥。后来朱熹和吕祖谦(1137—1181)又把程氏之说收进了他们合编的《近思录》。<sup>[10]</sup>到了真氏之时，董氏“正心以正朝廷”等语，几乎已成了理学家的口头禅，所以真氏此引，并不新鲜。但它却值得我们注意。如程颢只引了“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以说明“格君心之非”为治道之本，而真氏却引了整段，把君心和群生万物扯上了有机关系。

真氏引用扬雄《法言》之说，更属不寻常之举。《衍义》所引《法言》一段，节录如下：

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虽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sup>[11]</sup>

真氏以一心而治万事之意，从上引文可以概见，这里无须细说。要注意的是：到真氏之时，扬雄在“道统”中的地位已在朱熹的严厉批判下趋于消失；从《资治通鉴纲目》把扬雄写成“莽大夫”后，<sup>[12]</sup>朱门学者再不喜也不愿引用扬雄之说。真氏作为公认的朱熹私淑和程朱后劲，而不惜引用扬雄之说，且置于《衍义》的首章，可见他有从古籍中求取足以支持其“以心为重”之说的极端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真氏对心的重要性的强调，既非新见，也不罕见。“心”既指良心的心，也指心智的心，本来便是程朱学说系统中的重要成分。理学家是没有不谈“心”的，但真氏对心之全能的过分强调，却至少使朱熹哲学的规模显得狭隘了，对其动力也产生了局限的作用。朱熹寻求包括经世之学在内的学问关键，是所谓即物穷理，这在他著名的《大学格物补传》中宣示无遗。《补传》对于穷理与格物致知的相互关系，有如下的立论：

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sup>[13]</sup>

这个影响了以中国人为主的东亚人思维路线达八百年之久的著名理论，除了没有清楚地交代“用力”和“贯通”之法的一处外，对于朱熹的为学之方，可说已经宣泄无遗。在朱熹看来，如要实行《大学》所列的各条目，《大学》第一条目的“格物”，亦即他所说的穷理，必须首先彻底实行。朱熹当然承认“正心”的重要性，但一切须从格物穷理开始，然后才可如《大学》所说，“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真氏只管强调诚心，而不先重格物，无疑便把朱熹的规模缩小，构思切断。

真德秀对“诚心”的过分强调，在学术思想史上至少帮助引起了如下的一个转移作用：认识的焦点再不是待格之物而是待诚之心。绎而言之，内在的是必然优越于外在的，形上的尽可以决定形下的。真氏思想的要点既是以心为可以超脱外物而自我存在，那么，在论及由众人构成的国家时，自然也会强调包括帝王在内，人人都要以注意他们的“心”为首要之务，而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们所产生的关系之处理，却显得次要了。《衍义》没有对齐家或修身的道德或方法直接强调和充分发挥，便是这个缘故。

### 三 真德秀的政治遭遇与著作《大学衍义》的关系

为什么真德秀会这样的强调“心”，以至把它变成《衍义》的主题？纯从哲学理念的分析去寻求答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注意他的实际事迹所提供的线索。<sup>[14]</sup>真氏的宦业说明了他并非只顾空言，毫无建树。其实他算是个相当能干的官员，对政治局势具有敏感，对国家时政屡能建白。他晚年以翰林学士知贡举，虽闹出“误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饿夫”的笑话，<sup>[15]</sup>反映了他的不善经理，但前此他曾做多处的地方官，却屡为人民所称许。知泉州时，对于市舶司的经营很有成绩，还能替政府增加收入，<sup>[16]</sup>证明他也懂得理财。

更重要的是,他分明是个聪明而又现实的人。当他察觉到和与权相史弥远(1164—1233)为仇的皇子赵竑做伴所潜伏的危机时,他能毫不犹豫地离开朝廷,尽力避免卷入斗争的漩涡。当他再度回朝任高官时,他又懂得怎样去争取史弥远栽培出来的新宰相郑清之(1176—1251)的好感。他呵护郑氏在端平元年(1234)贸然对蒙古挑战的错误行动,弄得朱门学者黄震(1213—1280)也极为不满,<sup>[17]</sup>清代的史家也举此事为他“晚节多惭德”的例子。<sup>[18]</sup>但这些事情却正反映了真氏是个很讲实际的人,对现实政治能了解掌握,绝不像个只谈心不论事的人。以此之故,我们要明白他为何对心有极不平衡的强调,便不得不分析他著《衍义》时具体的政治和个人情况。

真氏的政治经历,至少一半与以专权闻名的宰相史弥远及以悲剧收场的皇子赵竑有关。<sup>[19]</sup>真氏福建浦城人,年十八举于乡,庆元五年(1199)始登进士乙科,授南剑州判官。开禧元年(1205)再中博学宏词科,入闽帅幕。次年召为太学正。同年宁宗所亲爱而将禅以帝位的吴兴郡王赵柄(追封沂王)薨,无嗣,乃立宗室子赵竑为嗣沂王。<sup>[20]</sup>(赵竑本名史书不载,立为嗣沂王后,赐名均,后改赐名贵和,最后改为竑。)嘉定元年真氏迁太学博士,次年迁秘书省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和学士院权直,以后官位屡迁,尝充金国使,未至而还。七年(1214),真氏却请辞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结果以秘阁修撰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在任期间,表现良好,声誉日增。十三年皇太子赵询薨,次年赵竑被立为皇子,封祁国公,又次年改封济国公。这时真氏刚免母丧回朝,被派兼任宫教,再度成为皇子竑的老师。<sup>[21]</sup>但不久他又力求外任,结果改知潭州。

真氏首次的离朝,一般说法是由于他不满史弥远的专横行为,但起复后的力辞而去,更明显地看出是他因企图及早避开行将面临的政治风暴所致。这时皇子竑与史弥远已经势成水火。史氏从未曾喜欢过皇子竑;皇子竑亦曾说过,如果他日得志,将把史氏放逐到新州或恩州等南荒边地。但这话却被他所嬖爱的美人,亦即史氏所派的间谍,转告史氏,史氏与其党羽遂密谋废立之策。当时的形势,史氏是占了上风的,主要是因为他有着当时第一女强人杨皇后的支持和合作。杨后以权术著称,又曾以用计使前此另一权相韩侂胄(1152—1207)垮台和被杀而受尊畏。<sup>[22]</sup>在这已经恶化的局势中,真德

秀曾劝皇子竑对宫朝之政保持距离,劝他要“孝于慈母而敬大臣”。<sup>[23]</sup>皇子竑没有听从,真氏于是力求转外。

史弥远同时也加紧进行对付赵竑的阴谋。在赵竑由嗣沂王改封皇子时,他已成功地安排了另一宗室代为沂王嗣,这人便是后来的理宗赵昀。到了这时,史氏又运用了一个极其精密的策略,使郑清之成功地把赵昀训练成一个“凝重寡言,洁修好学”的王子,既能文,又善书,举动也一样动人,如所谓“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见者敛容”,真像郑清之所说的一般,一切“不凡”,<sup>[24]</sup>营造成一个有威严而能引起尊敬的形像。结果,赵昀的声誉日增,而皇子竑名望日毁。与此同时,史弥远又运动了杨皇后的两个侄儿去争取她对拥立理宗的暗许。

皇子竑被废之事,终于在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发生。史弥远行动迅速,宁宗夜崩,未明而理宗已被立为新帝,皇子竑旋被改封济王,迁至湖州。<sup>[25]</sup>史氏同时又大施收揽人心的手段,建议新登位的理宗尊崇儒术。在这新策略下,包括真德秀在内的若干著名儒官被召回朝。稍后,真氏升任礼部侍郎,兼掌学士院。次年(宝庆元年)正月湖州发生了拥立济王竑的事件。济王对此事本不预知,起初他被迫诺从,最后还是带兵攻打叛徒。事件很快平息,但史弥远却派爪牙迫他自尽,<sup>[26]</sup>不久又追贬他的位号,从济王降为巴陵县公。

这个追贬位号的行为,激起了很多朝士的反感。真氏与其同志魏了翁(1178—1237)等也对这不义之事公开责难。在一次入见奏对中,真氏曾勇敢地直言理宗对这事处理不当。同年八月,真氏因而被劾,次月被解除了侍郎和学士之职,到十一月时,又被勒令回籍闲住——这还是幸得理宗的援助所致,否则他可能已被流放远方。到绍定四年(1231)改职与祠,次年,才再被任为地方官。及至史弥远死去,理宗亲政收召诸贤,真氏在被召之列,才于端平元年(1234)九月入见,是时去国已经十年。

就是在这段悠长的强迫休退的时期内,真氏写下了日后被名为《读书记》的著作。<sup>[27]</sup>《衍义》正是《读书记》内的一部分,书序作于绍定二年(1229),<sup>[28]</sup>可见《衍义》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从《衍义》的序和进书时所上的表、状,以及尚书省劄子等文件看,《衍义》正是真氏直上理宗的谏诤。



#### 四 真德秀对宋理宗的观感与 《大学衍义》的用意的关系

由于《衍义》实际上是为宋理宗而写的,真德秀对理宗的观感和期望,便可帮助说明他在书中所作各种强调的缘故。应该注意的是,宝庆元年真氏被迫离朝时,理宗只有21岁,登基不过十五个月,当时真氏所见的理宗和后代史家所苛评的理宗,便有所不同。从四十年悠长帝位的角度看,后代史家所给理宗“虽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的贬语,<sup>[29]</sup>尚算公允;但从南宋当时的资料看,真氏离朝时的理宗,并不完全这样。时人的印象及了解与史家的批评及见解,是个一时观感和终身论断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先分清楚。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真德秀离朝时,理宗仍是他及他的同志们认为可以寄望的君主,原因是理宗至少有如下的表现足以感动他们。登基不久,理宗对儒者之道显得用心致意,<sup>[30]</sup>对若干理学的经典著作有所了解,<sup>[31]</sup>对重要政事表现出认真态度,<sup>[32]</sup>对某些史事和时政也能作出独立判断。<sup>[33]</sup>此外,他留意斯文;自己的诗文也有造诣。更重要的,他是被视为有倾向儒学之意,和有追求、表彰道学的潜能的。凡此种种,都是儒臣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君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理宗竟然一一具备。即使嘉定十七年(1224)真德秀、魏了翁等被召回朝之事,在当时也有被视为是理宗好意趋向的结果的可能,虽则主意是史弥远所出的。到了次年宝庆元年真氏离朝时,朝臣对理宗已有“文章天子”的一致看法。<sup>[34]</sup>总之,从儒臣的立场看,当时的理宗,是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君主。

此外,理宗看起来还是个有理性的人。济王之死,与他无直接关联,死后的追贬,至多也是间接和名义上有关;但当真氏人对责难他对事情处置不当时,他并不生气,虽然只说“亦是一时仓卒耳”,毕竟还是暗承错误;当真氏接着请他“益讲学进道,以赎前愆,以收人心”时,他的反应也是正面的。<sup>[35]</sup>从这次入见奏对后,真氏对理宗的深切期望,看来是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儒臣的了。

理宗固然有弱点,但真氏却从他的理性的反应中产生了改善他的德性